

孙中山和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

黄彦

清朝末年，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运动，这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然而，标志着这个运动开端的历史事件——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的创建，却是在远离中国本土之外，在位于太平洋中央的檀香山发生的。这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曾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并就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的有关事实及其意义发表过不少评论。笔者不揣浅陋，也来参加议论。

(一)

众所周知，孙中山是在上书李鸿章碰壁、又受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而决意走向革命的。他企图集结力量、筹措经费以发动反清起义，那末，为什么选择了檀香山这块地方来推行他的第一步计划呢？

本来作为起义发动地点的广州和毗邻广州的香港，孙中山都已与一批政治上志同道合的爱国知识分子取得联络。在香港，他与成立于1892年的爱国小团体辅仁文社的主要成员杨衢云等有过密切交往。在广州，1893年曾与他的挚友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等一道酝酿过成立兴中会。孙中山显然是重视这些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力量的，但当时他们的人数很少，并也尚未实现从爱国到革命的思想飞跃；而要依靠他们来募集大笔资金，更是毫无把握。至于广州绅商和香港资产阶级，却未表现出反满的政治热情。于是，他把眼光移向海外，“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①。

在此之前，檀香山是孙中山在国外唯一居留过的地方。檀香山群岛，是当时华侨对夏威夷群岛的习惯叫法，它由八个大岛和许多小岛组成，那时候还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孙中山曾经两次到过檀香山：第一次自1878年6月至1883年7月，在那里整整呆了五年，大部份时间用于求学；第二次自1884年11月至1885年4月，在他哥哥孙眉开设的商店当了近半年的店员。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檀香山总人口还不及十万，华侨人口约占五分之一^②。华侨之中大都来自广东，尤以香山县人居多。孙中山在檀香山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群众基础，不仅有自己的亲属和亲戚，而且认识不少大小同乡、朋友、同学、师长和教友。象他哥哥孙眉在华侨社会颇有地位，在茂宜岛经营大牧场和开设商店，饶有资产，有“茂宜王”之称^③。十分明显，在孙中山心目中，这些都是他开展革命活动的有利条件。

孙中山对檀香山华侨的政治思想觉悟给予了充分的估量。他常对陈少白说：美国旧

金山的华侨“对于政治方面很少接触”，“而在檀香山的就不然，大埠（按指火奴鲁鲁，华侨俗称为檀香山正埠或大埠——笔者）就是京城，天天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所以中国侨民差不多个个有些政治思想。”④这当然也是组织政治团体所必须考虑到的。

中国人移居檀香山，始于十八世纪末叶。而大量移殖则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作为契约华工招募而来的。他们大都是广东沿海的破产农民，也有一些是因参加太平天国或广东天地会起义失败而被迫流亡的。他们初至檀时，大多数在蔗园或糖场做工，合约满期后，有的向当地政府批耕园地而成为独立劳动者，有的改做小商贩或开设小商店，有的从事自由职业，也有的逐渐上升为工商业资本家（主要是中小资本家，大资本家极少）。工人在檀香山华侨中占居大多数，同时在十九世纪后期也已形成了一个华侨资产阶级以及从事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阶层⑤。华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孙中山初期民主革命活动的主要依靠对象，他们同国内封建主义的联系比较少，又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并受到外国人的歧视，对清政府无力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深感不满，故容易产生革命情绪。当孙中山第三次来檀时，华侨中间，特别在华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间，有三个政治现实因素对他鼓吹革命是很有利的：

第一，美国加紧侵略夏威夷和华侨参加夏威夷人民的反美斗争。

自从美国的传教士于1819年进入夏威夷后，商人和冒险家接踵而来，与英法两国殖民者展开激烈的竞争。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势力已逐渐取得优势，一方面掌握了这个岛国的经济命脉，对土著居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一方面粗暴干涉夏威夷的内政，插手王位之争，操纵立法会议，强订不平等条约，在珍珠港建立海军基地，并策划着吞并夏威夷的阴谋。夏威夷国王架刺鸠不甘心于充当美国的傀儡，提出了“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口号。1888年7月，夏威夷土著居民在威里确时的领导下，为恢复架刺鸠的权力而发动反美武装起义，华侨知识分子何宽、李六、黄桂等参加了战斗的行列（他们后来都加入兴中会），但这次起义在当天便遭到了亲美势力的镇压。架刺鸠于1890年病死，其妹利利奥固兰尼继王位，仍然坚持“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这一口号，并于1893年初颁布新宪法，限制立法会议的权力和外国人的特权。在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武力支持下，一批美裔居民发动政变，胁迫女王退位，宣布废止君主制和成立临时共和政府。1894年，也即孙中山来檀组织兴中会的这一年，许多华侨情绪激昂，和土著居民站在一起秘密谋求恢复女王的权力，坚决反对美国吞并夏威夷的计划（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吞并夏威夷）。华侨亲历了这一系列的政治事变，使他们意识到祖国的衰弱将会导致亡国危机；又因夏威夷君主制的被废除，而领悟到祖国的政体也并非不可移易的。这种认识加深了他们的爱国观念，同时也有助于他们接受反清思想。例如孙眉“往日思想顽固，侧重保守，至是耳濡目染，心理为之一变，每闻乡人自祖国来，报告总理时作歌颂太平天国及反清复国言论，咸不以为异。戚族中有恫以抄灭家族等辞，促其劝阻总理行动者，概一笑置之。”⑥

第二，反对美国排华的暴行。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美国资产阶级开始掀起残暴的排华浪潮，八十年代以后排华暴行更是愈演愈烈。这股浪潮从美国大陆蔓延到了夏威夷群岛，各地陆续出现了驱逐

华人的惨剧。在檀香山华侨资产阶级的发起和领导之下，侨胞们于1887年相继成立了“保安局”、“联卫会”等自卫组织，以“杜外侮、御灾难”为宗旨，与美国殖民者展开积极的斗争。1893年初，刚刚成立的夏威夷临时共和政府制订排华的“禁例”，宣布禁止华人经营新的工商业。2月14日，檀岛商店除饭馆外全体罢市，华侨约三千人在火奴鲁鲁的中国戏院集会提出抗议。1894年秋，也即孙中山抵檀前夕，夏威夷当局借口防疫，将华侨数千人拘禁并施以残暴，当晚又放火焚烧唐人街，使之成为一片瓦砾焦土。华侨身受美国排华之害，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为痛恨，并在斗争中增强了民族观念和革命意识。参加反对美国排华斗争的积极分子如刘祥、何宽、李六、郑金、刘寿、程蔚南、黄华恢、林槛泉等，都成了最早一批的兴中会员。又如商人夏百子，“感受外人苛待，时怀反抗之心”，当孙中山“倡起革命，复我中华，说到满人苛政，夏君即恨不能生吞胡虏，由是以身许国，且变产输诚，追随先总理左右。”^⑦西餐馆老板宋居仁，“感觉得各国西人对于我华人非常苛待，故此革命之心日炽”，听人说孙中山“极力宣传革命，斯时颇为心动。未几果见其来餐店，对居仁说明实行革命。居仁闻知立即将西餐馆生意收盘，挺身随他行革命。”^⑧

第三，受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

战争中，清政府在海陆两路接连打败仗，消息传至檀香山，英文各报极尽讥讽之能事，使华侨愤恨不已。例如工商业家兼农场主、后来成为兴中会发动武装起义的骨干分子邓荫南，“中日中东战起，感祖国之危亡，慨然有澄清之志。”^⑨

因此之故，孙中山终于能以不长的时间，在檀香山较顺利地实现了他组建兴中会的任务。

(二)

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的事实经过，由于保存下来的第一手材料不多，有一些还不是很清楚的。不少被认为已有“定论”的问题，其实仍值得提出来继续研究。

根据有关记载，孙中山大约是在1894年10月或11月间抵达檀香山的^⑩。他在火奴鲁鲁有一个经商的亲戚叫程蔚南，是全檀第一家中文报纸《隆记报》的老板。前一年，由该报记者何宽（兼任卑涉银行经理），译员李昌（兼任政府机关译员）、陆灿（孙中山同村人）和海关译员郑金（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念书时的同学）等发起，在报馆内组织了一个学术性团体“中西扩论会”，吸收不少优秀的华侨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孙中山筹建兴中会的工作，便是通过《隆记报》和“中西扩论会”的骨干分子进行的。过不久，由李昌、何宽等串连了二十多名进步华侨，到何宽寓所集会^⑪。在孙中山的主持下，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与会者举行入会宣誓仪式，并分别选出刘祥（永和泰杂货店司理）、何宽为兴中会正副主席，程蔚南、许直臣（教员）为正副文案，黄华恢（永和泰号司帐）为管库，李昌、郑金、林槛泉（《隆记报》编辑）、李多马（商人）、李六（商人）、黄亮（商人）、钟宇（工厂主）、邓荫南（农场主）等八人为值理。檀香山兴中会便这样正式宣告成立了。

檀香山兴中会究竟是在哪一天成立的？据《檀山华侨》转载由何宽收藏的一份兴中会会员缴纳会费的花名册，可知最早交费的日期是11月24日（阴历10月27日），交费者

为何宽、李昌两人。不少著作便把这一天作为檀香山兴中会成立的日期。1954年,国民党中央更在台湾明令确定这天便是兴中会的成立日期,主要是根据该党党史会提出的两条理由。一是说何宽、李昌“既同为发动组党最热心者,而第一次开会又在何家,则以何、李两同志交费之日,即第一次开会之时,亦为近情合理之推断”。二是发现《张溥泉先生全集补编》有一段札记,记载陈少白说这一天“在檀岛同志约一百二十人,在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家正式成立兴中会”,从而认为“陈少白先生系总理最早期之发动革命组织之同志、兴中会会员,当时与总理关系最为密切,陈先生所说当属可信。至于张溥泉先生是本党前辈,与陈少白先生过从甚密,其札记中记载陈少白先生所云,当系亲闻之于陈先生者”。故“可证明十一月二十四日就是兴中会正式成立之日期,是日为本党创党纪念日,当可成为定论”。^⑫

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日期是否因此就有了“定论”呢?那倒不见得。先以上述所举的第一条理由来说,既然那天有二十多人在何宽家里开会,如果布置大家缴交会费的话,交费的肯定不只何、李两人。入会费每人征收五美元,与会者都是些有身份的人士,还不至于交不起。因此,更加“近情合理之推断”,当是在举行成立会议之后,再安排征收会费这项工作的。也即说,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稍早于11月24日的可能性会更大些。至于第二条理由,张继(溥泉)记载陈少白所说的内容本身就存在错误,即何家不可能举行有112人参加的成立会议。事实上,陈少白对檀香山兴中会的创建时间和经过是不很了解的,他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提到这件事时只是笼统地说,“大约是在年(甲午)八、九月之间,就正式成立兴中会”^⑬。1931年11月8日他就兴中会成立问题给国民党党史会写了一封复信,也只是肯定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却未提及具体月日^⑭。因此,不论陈少白与孙中山、张继的关系是如何密切,他的话都不足以作为确定史实的证明。据笔者所知,1944年国民党政府曾经饬令中国驻檀香山总领事梅景周调查1894年11月24日是否即为兴中会的成立日期,经梅景周电复:“各方探询,无法证实。钟宇老同志(按:钟宇曾出席兴中会成立会议)亦谓不能记忆。”^⑮由此可见,这是一个经过长期努力探究而至今犹悬而未决的问题。根据孙中山抵檀时间等有关情况来看,我们只可肯定兴中会成立于11月间,稍早于是月24日,但间隔的时间不会太久。

孙中山制订的《兴中会章程》,过去曾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其实,它来源于何宽收藏的当年兴中会文件的原本,《檀山华侨》根据这个原本全文予以刊载(刊载时题作《兴中会宣言书》),因而是毋庸置疑的。关于这个文件,有几点颇值得我们注意^⑯:

第一,这是孙中山第一篇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清朝腐朽统治进行揭露和谴责的著作,其基调与数月前的《上李鸿章书》有很大的不同,这反映了他在政治思想上确已实现了质的飞跃。

第二,它带给读者以一种强烈的危机感,用“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这类尖锐的词句,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文中提到“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更令人感到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给孙中山带来了何等的愤慨不安。这促使他要奋起“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建立兴中会,实行反清革命,都无一不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华

民族的压迫。因此,我们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提出的“排满”口号,必须与他们的爱国主义立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任务联系起来考察,从而给以积极的评价。

第三,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不能贬低孙中山为兴中会所规定的“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宗旨的积极意义。“振兴中华”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它能够激励广大爱国者为摆脱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共同的斗争。而所谓“维持国体”,便是要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体制,不使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在孙中山看来,中国正是由于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使“国体抑损”;只要实行兴中会的宗旨,中国人民便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这恰恰表现了孙中山作为一个爱国者和革命先行者的伟大胸怀。

第四,诚然,这个章程并没有明确提出推翻满清的革命主张,也没有具体阐明“振兴中华”所应采取的革命原则和方法。这固然有孙中山主观认识上的局限,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当时的客观现实条件而过份苛求。无论如何,孙中山是为了准备反清起义才创建兴中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文中尚不便明言筹饷起兵字样,以免会员有所戒惧,盖其时华侨尚多不脱故乡庐墓思想,惴惴于满清所派公使、领事之借辞构陷也。”^{①7}

第五,章程所规定的一些管理方法和组织原则,已与中国传统的秘密会党有很大的不同。如规定“凡会内所议各事,当照舍少从多之例而行”,便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这表明,兴中会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近代政党的色彩,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除章程外,檀香山兴中会是否有孙中山起草的秘密誓词(即入会盟书)的存在,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誓词的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监察。”其材料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1929年在檀香山出版的《檀山华侨》,该书收有国民党茂宜支部现任执委邓想所撰的《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一文,记录了如上誓词的内容;还收有当年兴中会员陆灿所撰的《孙公中山在檀事略》一文,指出入会时要宣读誓词并介绍宣誓的经过,但未列出誓词的内容。另一种是冯自由所著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和《华侨革命开国史》,均出版于1946年,对誓词内容及宣誓方法都有介绍。这两种材料来源之中,应以前一种的价值较高。因为当《檀山华侨》编辑出版之时,就地查访资料较易,一些老兴中会员也还健在,利于核对事实。而从孙中山当时的思想认识状况以及他到檀香山所要担负的任务来看,提出这样的誓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此外,孙中山后来也曾对人谈及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时领导会员宣誓这回事^{①8}。由于缺乏原始的文字记录,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下最后的结论,但笔者是倾向于相信当时有这个誓词的存在。和孙中山的革命实践相适应,他在誓词中明确提出了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政府的革命目标,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主要从事如下三项活动:

第一,扩展兴中会组织。分派会员到各埠发动,如李昌、宋居仁到茄荷蕾,建立了以孙眉为主席的兴中会分会;孙眉又到百衣,建立了以邓荫南为主席的兴中会分会。这年冬天和次年间,陆续有一些华侨入会,总数约达130余人。在有名籍可稽的128名会员

中, 华侨资产阶级(商人、农牧场主、工厂主、银行家等)79人, 占61.7%; 自由职业者(公务员、新闻记者、教员、医生、技师、宣教师等)15人, 占11.7%; 工人34人, 占26.6%。他们都是广东人, 其中香山县籍72人, 占56.3%。^{①⑨}

第二, 筹募起义经费。根据章程的规定, 向会员们征收会费, 当时称为“会底银”。至1895年1月截止统计, 共有58人交费^{②⑩}。另设“中国商务公会”集股, 以孙中山为该会总理, 兴中会主席刘祥兼任司库, 规定每股100美元。结果共有兴中会员6人购买9股(邓荫南3股, 孙眉2股, 古同、郑仲、容吉兆、李多马各1股), 当地土著居民购买2股(购买时是否了解其政治用途, 则不得而知), 总共收入1100元^{②⑩}。孙中山原希望从檀香山筹集一笔回国起义的经费, 但到旧历年底收入仍不多, 心中很着急。邓荫南、孙眉得知后, 又变卖一部分资产捐助, 才拼凑了6千多美元(折合港币13,000元)带回国去。

第三, 实行军事训练。经孙中山提议, 组织了华侨兵操队, 有20多名兴中会员报名参加。聘请曾到中国充当南洋练兵教习的丹麦人柏担任教官, 每星期到寻真书室的校外操场操练两次。后来, 有一些兴中会员(知其姓名的有7人)陆续回国, 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筹备活动。

尽管檀香山兴中会的力量很薄弱, 也存在许多不成熟的地方; 但从它诞生的历史背景、组成情况、立会宗旨、斗争任务及其实践活动等方面来看, 都是一个反映了在新条件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要求的、代表着正在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革命团体。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出现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那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的观点, 现在看来, 似乎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注:

①《建国方略之一: 孙文学说》, 《孙中山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 第193页。

②据郑东梦编《檀山华侨》(檀香山1929年版)统计: 全檀总人口1878年57,985人, 1884年80,578人; 华侨人口1882年13,500人。1896年, 全檀总人口109,220人。华侨人口21,616人。(参见该书“檀香山”部分第12页, “檀山华侨”部分第2页)。

③参见郑照:《孙中山先生逸事》,《逸经》第4期;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 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第26—27页。

④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建国月刊》第1卷第2期。

⑤例如, 据十九世纪末某年统计, 华侨中的商贾800多人, 自由职业者600多人, 工人和其他劳动者11,000多人(参见《檀山华侨》“檀山华侨”部分第6页)。

⑥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第2—3页。

⑦黄大汉编:《兴中会各同志革命工作史略》, 广州南洋华侨真相剧社1929年版, 第8页。

⑧宋居仁口述, 同上书第10—11页。

⑨胡汉民:《邓荫南传》, 载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 商务印书馆1944年增订版, 第4篇, 第1225页。

⑩一般书籍都认为孙中山于阳历10月抵檀, 但据参加兴中会成立会议的宋居仁说, 孙中山是在“光绪二十年十月”抵达的, 则应为阳历十一月(见黄大汉编:《兴中会各同志革命工作史略》, 第10页)。

⑪还有一个说法: 嗣因场地狭小, 移至李昌寓所开会(参见王瑛琦等:《关于孙中山的传记和考证》, 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版, 第144页)。

- ⑫《中国国民党中央明令确定创党纪念日案》，《革命文献》第64辑，台北1973年版，第50、54页。
- ⑬《兴中会革命史要》，《建国月刊》第1卷第2期。
- ⑭《陈少白为说明兴中会成立时间地点复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函》，《革命文献》第64辑，第49页。
- ⑮据《林百举日记》（稿本）转录。
- ⑯以下引文，均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20页。
- ⑰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6页。
- ⑱孙中山曾对陆丹林说：宣誓是模仿欧美及檀香山居民在法庭上作证的方式，“借以坚定会员入会的志向，忠诚不渝，不是马马虎虎的玩意儿。加入兴中会对当时专制统治政府说来是大逆不道的造反行为，按清律是要杀头甚至抄家灭族的，故不得不设法坚定同志们的信心。”（陆丹林：《孙中山计划兵工筑路的回忆》，未刊稿，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
- ⑲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同书第3集“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冯自由《檀香山老兴中会员及其遗族》（载《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号）、黄大汉《兴中会同同志革命工作史略》、贾道曾编《兴中会史料汇编》“人物志”（由《林百举日记》转抄）等材料综合分类统计。按：笔者在1965年打印的《孙中山年谱新编》（初稿）第一分册中所列的统计数字及其材料出处存在着若干差错，但却为近年出版的某传记读物所转引，为不致以讹传讹，特于此附带说明。
- ⑳参见《檀山华侨》“檀山华侨”部分第16—17页。1895年2至9月，又有会员53人陆续交费。
- ㉑参见上书第17页。李多马所购买的中国商务等公会股券仍保存至今，原文为英文，其中译文可阅《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21页。

（上接第98页）

- | | |
|-------------------------|---------------------------|
| ⑭⑮《后汉书·党锢列传》。 | ⑳刘逢禄《箴膏肓评》，《续清经解》本。 |
| ⑰另见《赵岐孟子题词》。 | ㉑转引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 |
| ⑱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第172页。 | ㉒梁启超《读春秋界说》，《饮冰室文集》二。 |
| ⑲参考皮锡瑞《六艺论疏证》； | ㉓刘师培《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论微序》。 |
| 陈澧《东塾读书记·诗说》。 | ㉔荀悦《申鉴·时事》。 |
| ⑳《孟子·滕文公》。 | ㉕《公羊解诂》何休自序。 |
| ㉑《史记》太史公自序。 | ㉖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 |
| ㉒《公羊解诂》何休自序。 | ㉗见《公羊解诂》隐公三年、襄公七年、僖公二十七年。 |
| ㉓《后汉书·贾逵传》王先谦集解。 | ㉘《公羊解诂》桓公五年。 |
| ㉔另可见徐震《公羊榘论·胡董》。 | ㉙《公羊解诂》成公二年。 |
| ㉕胡玉缙《许广学林·公羊多随二创说》。 | ㉚《公羊解诂》桓公十五年。 |
| ㉖王国维《观堂集林·书〈春秋公羊传解诂〉后》。 | ㉛《公羊解诂》隐公元年。 |
| | ㉜《公羊解诂》桓公十六年。 |